

#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isdom: Value Significance and Realization Path

Shengli L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00, China

## Abstract

The community is the “last kilometer”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to serve the residents. Nowadays, building a smart community under the intelligent background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the core is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ublic structure, meet the gravity forc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e best channel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public governance.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accurate role positioning of neighborhood committees, weak enthusiasm awarenes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smart community. It is our current responsibility and task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curr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 Keywords

wisdom; community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 智慧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转型：价值意义和实现路径

李盛莉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上海 201600

## 摘要

社区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联系、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如今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化背景下建设智慧社区是推动社会公共结构转型的强大动力，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万有引力，同时也是提升社会公共治理水平的最佳渠道。但社区治理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居委会角色定位不准确、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意识淡薄以及智慧社区运营困难等问题，解决当前社区治理转型面临的困难是我们当前的责任和任务。

## 关键词

智慧化；社区治理；转型

## 1 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目标，强调“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更好地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sup>[1]</sup>。论文的社会治理转型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的转变，人口由农民转为市民、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管理由村委会转为居委会，是农民基于共同生活习惯与行为约束所建立起来的相对开放的共同体组织。

【作者简介】李盛莉（1996-），女，中国河南驻马店人，硕士，从事社会治理研究。

## 2 智慧社区的价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社区”这一概念逐渐被政府所采用。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也直接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的调整，传统的农村过渡到城市社区。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sup>[2]</sup>在当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背景下，现有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社会治理以“智慧”为代表的社区应运而生。

### 2.1 智慧社区概念的界定

近年来，“智慧社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仍然没有对智慧社区达成一致的概念，但是总体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第一种观点认为，智慧社区是政府、市场和居民利用新兴技术手段打造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社区。第二种观点认为，

智慧社区就是利用各种智能技术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偏向于便捷服务的社区。第三种观点认为,智慧社区就是运用高科技的手段为居民打造一个具有高品质生活质量的社区,更好满足于人民的美好生活。这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都认为,智慧社区是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高科技手段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打造的社区。笔者认为,“智”就是结合当今的大数据的智慧化背景,运用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的新兴信息技术,“慧”就是结合当今的时代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的目标,实现居民和社区的良好互动。“智”和“慧”的结合就是时代背景和实时形势相结合,共同打造社区一个新的精神文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 2.2 智慧社区的价值意义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坚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关键、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改革创新为动力,健全体系、整合资源、增强能力,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可靠保证<sup>[1]</sup>。政策出台后,中国各地政府结合当今的智慧化背景,纷纷响应并出台相关政策全心全力为居民建设智慧社区。

### 2.2.1 加速城镇化进程,推进传统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升级

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增强城镇地区对乡村的带动能力<sup>[4]</sup>。但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内卷现象。传统的农村社区面临着青年劳动力不足、资源短缺、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使得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难度加大。针对传统农村社区面临的难题,智慧社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依托当今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高科技的手段并结合当今的时代思想,始终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原则,通过对传统社区一些大大小小的“难点”进行改造升级,为居民营造一个便捷服务、办事高效的智能社区,来加速城镇化进程,推动传统社区向智慧社区的转变,最终实现传统社区治理的转型升级。

### 2.2.2 优化空间结构格局,满足现代化新型城乡关系需求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统的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传统的农村社区正在逐步向城镇转移,通过运用高科技手段,着力为居民打造一个便捷化、智能化、服务化的社区,来满足现代化新型城乡关系的新需求。一方面,智慧社区的建设能够避免传统社区的“宗族制”。高科技手段建设的社

区使社区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使社区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结构,而是立体化、层次化、智能化的网状结构,优化了社区的空间结构,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的社区空间结构格局。另一方面,智慧社区的建设能够满足现代化新型城乡关系的需求。传统社区多是以“单位制”为核心。在国家指导下,政府主导一切,居委会主导社区的一切事务,缺点就是会出现官僚主义的倾向。智慧社区始终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其核心目标,致力于为居民打造一个具有较强内聚力、便捷舒适和高生活品质的社区,实现人与社会和社区之间的和谐共处。

### 2.2.3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和质量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强调,要加大“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的推进力度,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融合发展,充分运用社区论坛、微博、贴吧、短视频等新兴媒体平台,引领社区居民融洽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组织协商活动、关爱邻里互助,不断创新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智慧社区的建设将充分利用智慧化的背景为依托以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为核心对“互联网+社区”的治理模式进行改革、创新和完善。针对当前中国传统社区向智慧社区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升社区的公共服务质量和社会治理水平为着力点,致力于为居民打造高生活品质和质量的社区。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给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应急反应和应急能力带来了一场严峻考验,而智慧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的构成单元,不仅为高效赋能疫情防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且为居民的生活质量提供了安全保障。首先,它通过智慧社区平台及时有效发布疫情防控信息及防护知识,社区居民只需要通过智慧社区“居民通”APP就可以获取相关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区居民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紧迫感和重视度。其次,它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社区居民的数据反馈进行在线收集、研判和归档,提高了居民的在线沟通协作能力、减少人员外出以及降低病毒传播风险。最后,它利用5G网络具有的高速率、低延迟、大连接等特性对安防巡检机器人进行灵活部署,助力筑牢疫情防控“社区防线”,社区治理效能大大提升<sup>[5]</sup>。

## 3 智慧化背景下社会治理转型面临的现实困境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视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不断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升级与完善,加大宣传“全周期管理”的理念,积极寻求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方案。“全周期管理”的要求为新时代智慧城市建设、智慧社区建设指明了发展的路径和目标。中国各地政府紧跟潮流和趋势掀起了智慧社区的建设热潮。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居委会角色定位不准确、转型社区居民集体意识薄弱以及智慧社区运营能力有所欠缺等仍然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难题。

### 3.1 居委会角色定位不准确

中国鼓励智慧社区建设按照“政府主导、行业协同、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这一模式推进。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居委会的角色没有明确的定位。转型社区的居委会一般都是随着传统社区而来的。居委会实际上是准政府的控制机构，主导社区的事务，政府是居委会实际工作的指导者。在此影响下，智慧社区的居委会由行政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还未适应仍旧主导社区的一切事务决策，大量的行政事务占满了居民相应的需求，无法按照居民的要求对社区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样地，转型社区中的大部分居民从农村的传统社区转型而来，他们也不清楚甚至不了解不知道居委会的角色和职能。因此，居委会对其自身的定位也不准确，使其没有正确发挥职能。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是为居民社区服务的重要载体。在智慧社区中，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不管是硬件服务还是软件设施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智慧社区建设的前提是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作为支持，然而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却力不从心。智慧社区建设对资金的依赖程度较大，然而现阶段，社区居委会的资金来源基本上是政府财政拨款，其资金投入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慧社区的发展速度。

### 3.2 转型社区中居民集体意识淡薄

从传统的农村社区到当代智慧化背景下的智慧社区；从以农村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区转型到如今以城市建设为基础的社区；从邻里关系和谐，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邻里关系转型到当代以一个居住共同体为基础的社区，有着不同的地域、背景以及工作。由于传统的邻里互助关系遭到破坏，在新的陌生社区以及社区的公共服务不完善的双重制约下，转型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也尚未形成。一方面，邻里之间打破了以土地和血缘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邻里之间的互动较少，社区内部分居民的自律性和自觉性比较低，很容易引发冲突矛盾。另一方面，土地承载了传统村落的血脉，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根基。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以及智慧化背景下的智慧社区的冲击下，由传统的农村社区转型过来的部分农民会不适应和不习惯，一些年龄大的居民甚至不了解以及不会使用当今的智能手机、电脑、iPad等科技手段。乡村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城市中的快节奏、多样化、层次化的生活所代替，他们会显得与城市格格不入，继而对社区的集体意识也不强。

### 3.3 智慧社区运营能力有所欠缺

智慧社区的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作为支持。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工作中，智慧社区建设的运营能力薄弱。一方面面临着财政资源的短缺。建设一个具有内聚力、便捷服务和具有高品质生活质量的社区，前期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后期也需要高额资金维持和修补完善。现在社区中的资金只有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其余没有途径能

够得到资金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慧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人力资源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的整体水平不高，而且社会的福利待遇对工作人员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较低的福利待遇使社区的服务人员积极性整体降低，这也是当今的年轻人毕业后不愿回农村或者社区工作的一部分原因。社区工作者大部分都是一些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对网络技能不熟练的人，都是从传统的农村社区转型而来，习惯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农村生活，很难融入智慧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相反年轻人更喜欢居住在一个方便和高质量生活水平的社区。面对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年龄层次、教育背景以及技能方面的差异，很容易遇到一些问题得不到调解。因此，社区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以及社区服务人员运营能力的不足成为建设智慧社区的一大关键难题。

## 4 智慧化背景下社会治理转型的路径

智慧社区作为推进新时代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中国政府应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战略指导意见，以引导各地区、城市智慧社区的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国家、省市县各层面协调管理智慧社区，不断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现代化的新型城乡关系融合。

### 4.1 秉持为人民服务宗旨，深化为居民服务意识

智慧社区建设的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因此，在转型社区治理中政府科学的角色定位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与引导，实现由行政型主导型政府向服务型指导转变。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更加开放和多元。政府应合理利用转型社区边缘效应，助力构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在“互联网+”为主题的智慧化背景下，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可以帮助政府或者管理者更科学、便捷地认识、分析和处理工作中的问题。一方面应打破传统社区治理模式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弊端，管理者应提高以及践行由行政化向服务化转变的意识，注重社区的治理效果，提高效率，为尽早实现智慧化社区而努力；另一方面应依托互联网的信息技术，简化社区办事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促进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其中，发挥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表达权，也实现管理者的角色由行政化主导型向服务型转变，确保人民的权力得到保障以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 4.2 构建完善的社区关系，增强社区居民归属感

社区关系网络是在邻里空间关系基础上生成并融合在一起的。良好的社区治理结构有益于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新型社区网络关系是以熟人社会为依托，社区居民在共同的行为准则与共建机制的约束下，创造相互信任、团结互助、真诚相待的社区邻里环境。要搞好智慧社区的转型建设，需要进一步确定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智慧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其一，科学规划社区空间。注重空间融合与贯通，为转型社区居民构建具有生活重叠性

的公共空间,确保其保持一定频率和质量的邻里互动;其二,丰富社区邻里组织。培育多种类型的社区组织,促进各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为邻里互动提供组织载体;其三,大力增加人才的引进。要以专业和业余的人才队伍为依托,进一步挖掘社区网络关系的生命力,组织开展多种社区活动和公益性的活动,使社区居民在参与活动过程中不断增加社区归属感,也更好地构建了较强的社区网络关系<sup>[6]</sup>。

#### 4.3 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加强社区治理智能化

智慧社区涵盖多个方面,建设内容巨大又复杂,因而需要投入足够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作为支撑。一方面,积极引进一些相关领域的高级技术人员组成智慧社区建设小组,为打造安全、便捷、宜居的社区建言献策。此外,还应加大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并依托5G、区块链以及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水平提高其知识与技能水平,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拓宽资金获取渠道。例如,政府一般将经费按照一定的财政预算比例划给智慧社区试点项目,用于其建设和维护,而为了保障政府对社区公共运行经费财政投入的预算及时足额到位,必须建立相应监督检查机制和奖惩评价机制,确保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检测、维修以及维护基础设施等方面。除此之外,在建设运营方面,要加大投融资模式的推广与应用,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加入到智慧社区项目建设和运营中,

让每一个居民都能共享智慧社区建设的成果<sup>[7]</sup>。

## 5 结语

当今中国的农村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正在经历转型。新时代背景下,作为推进农村社区治理转型的重要体现就是智慧社区的建设。智慧社区建设有望成为塑造现代化新型城乡社区形态的新形象,促进社区居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新目标,推进传统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推动器,也有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

### 参考文献

- [1]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文)[Z].
- [2] 易元芝.走向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优化研究——以温州市社区建设为例[J].攀登,2018,37(4):90-94.
- [3] 佚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J].农村实用技术,2017(9):4.
- [4] 佚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Z].
- [5] 白宇,岳弘彬.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EB/OL].中新网(chinanews.com).
- [6] 王振坡,张安琪,王丽艳.新时代我国转型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1):89-94+101.
- [7] 曹海军,侯甜甜.新时代背景下智慧社区建设:价值、逻辑与路径[J].广西社会科学,2021(2):1-7.

(上接第59页)

家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高速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雷洁,李思经,赵瑞雪,等.面向科研档案管理的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研究[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0(5):38-39.
- [2] 符家乐.浅谈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现代化的方法[J].科技资讯,2020(11):56.
- [3] 冯雪.建构高校非遗档案收集分类新模式——基于河北科技大学非遗档案管理实践[J].档案天地,2019(11):67-68.
- [4] 杜文馨.发展初期地方高校外事档案分类管理模式分析[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33):234-235.